

充满争论的记忆

——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
(Wolfgang Schwentker)

内容提要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日本与德国在战后面临不同的环境,导致日本有着自己的对待二战历史的政策,但是,从战争一结束,德国彻底清算了希特勒的罪恶,而日本天皇裕仁却被美国用来稳定战后日本的政治秩序。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的认知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当前,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把历史做为工具加以利用。

关键词 战争责任 日德比较 历史政策 清算

2014 年 4 月 29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德国之际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的长篇采访。访谈一开始他就提到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方式。人们主观上认为,德国在这方面堪称模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打算效仿德国树立的榜样,因为 1945 年后德日两国与邻国达成政治和解的基本条件太不相同了:当时,不光是联邦德国(即西德)在寻求与法国和其他昔日敌国进行调解,西欧各邻国也以和解为目标主动寻求与西德言归于好,这才使得欧洲一体化成为可能。而在亚洲的情况正相反,尽管日本政府努力通过与各国政府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并向亚洲邻国提供了财政资金用以支持它们的发展,邻国这边却没有意愿与日本达成谅解。“今天人们必须以谦逊的态度面对历史”,安倍装出一副天真的表情,“我认为,人们应当避免出于外交或是内政的动机去操弄历史议题”。^①

日本首相上述言论所表达的观点,在他几个月前即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参拜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之后,就成为国际舆论激烈论战的焦点。这场论战是由日本和中国的大使分别代表各自政府进行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方面经常援引德国对待国家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榜样方式。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对德国人民勇于正视历史并正确处理历史问题表示极大的敬意。如果日本能

^①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9. April 2014.

像德国一样,也将能取得亚洲和世界各国的信任并实现和解。”^①

德国的“历史反思”政策不仅得到了外国(中国、韩国、美国以及德国在欧洲的邻居)的赞赏,就连多数德国人在今天回顾1945年后针对独裁和战争进行的“清理”时,也认为做得足够多了。这样的态度就使得德国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历史反思”的问题上不时给日本提一些聪明的建议。典型的例如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他是德国颇具影响的《时代周报》的编辑,他最近在为《国际纽约时报》撰写一篇特约文章时就采用了指导教师式的标题《德国可以教给日本什么》。^②比特纳在文中明确提出了三点:第一,日本政府眼下低估了所谓的“象征政策”的作用,日本有义务面对中国采取一种鲜明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以展现其对于战争苦难的歉意;接着还有第二个任务:发表一份不容易被误解的、长期有效的罪责忏悔声明;第三,日本必须在诸如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而不能总是等着邻国来发起倡议。

这些给日本的建议肯定用意是好的,但没有命中当前的政治现实和权力关系,而且,它们在批评日本历史政策落后的同时把德国在“历史反思”问题上的榜样作用理想化了。对此人们肯定发问:用简单的黑白图像——好人德国与坏人日本——来描述两国与战争的关系及其战争记忆是恰当的吗?^③

对失败者的清算

战争刚一结束,胜利者就首先展开了对昔日战争对手的清算,这项工作不论是在西德还是在日本都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从两个帝国的政治领导层来看,还是从权力机关与民众对失败的反应来看,德国与日本之间都出现了明显差别。在德国,希特勒为避免被俘于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即将完全占领柏林之前自杀了,戈培尔和希姆莱也在5月选择了同样的道路。由此,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代表人物自行停止了活动。在此之前,围绕希特勒的所谓“领袖崇拜”是政权的重要一体化符号,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灾难发生之后,许多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抱有怀疑,与此相对,领袖个人却被排除在怀疑之外。“如果领袖知道这个就好了”这一惯用说法很好地表现了民众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矛盾态度。随着希特勒的自杀和1945年5月8日至9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对领袖的崇拜在一夜之间崩塌了,并转向了它的反面。然后,人们把所有的罪行和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希特勒一个人身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1933年1月掌权后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全能独裁者的自传,例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就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恶棍的独自冒险”。^④

与此相对的是,有关天皇在1945年前军事统治中的角色及其对战争应负责任的讨论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方向。那时的政府首脑吉田茂把那一时代的人对此的看法概括为:天皇乃是“统而不治”。^⑤这个解释在本质上是恰当的。裕仁不是一个强大的独裁者,而是一个虚弱的君主,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跟德国的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随从不同的是,在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领袖人物,也不存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其中的部分政治军事精英自行其是,确立

① Shi Mingde, Japan gefährdet den Fried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Januar 2014.

②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14.

③ 主要参考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London 1994; 栗屋憲太郎他編『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聞社、1994年。

④ Golo 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1958, 322.

⑤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4巻、東京白川書院、1983年、83頁。

了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系统”。天皇容忍并加入了这个系统,并且是这个系统的柱石之一,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承担了一部分政治责任。他对日本的政治军事路线表示同意,却并未亲自大力推行。与希特勒正相反,裕仁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作为近似于神的君主,在一定意义上是凌驾于具体事务之上的。他的个人魅力并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和特别的光彩之上,而是仅仅基于他所代表的职位。他于1945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讲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并且对他的宫廷日语几乎不能理解。天皇通过广播演讲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亲自宣告了战争结束,这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名和平发起人。相对于德国把所有罪责都推卸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日本过渡政府首脑东久迩宫稔彦王在1945年8月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把战争失败归咎于“一亿人的无能”,也就是日本人民自己。这十分符合日本新主人的心意。很快,占领军首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决定不把天皇送上军事法庭,而是利用他稳定日本的新政治秩序。尽管持左翼和自由观点的知识分子呼吁对所谓的“天皇体制”进行批判性分析,但多数日本民众从来没有追随这一立场。在1989年1月裕仁去世后的几周内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69%的日本人认为天皇对1945年前的政治不承担责任。

德国与日本的政治军事精英代表,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被推上了国际军事法庭。在这个层面,德国与日本的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别。在纽伦堡和东京进行的战犯审理程序只有一个共同点:审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有罪的人,还在于把他们的罪行公诸于德日两国以及全世界公众面前。围绕这两场审判的记忆存在一个矛盾:在德国,有关战争罪行的记忆是鲜活的,但纽伦堡审判却已经淡化为背景;在日本恰恰相反,人们对东京“胜利者审判”的记忆恰恰为战争罪行记忆的消退做出了贡献。而且,日本的战犯审理程序(23人被起诉,7人被判处死刑)标志着对战争进行司法清理的结束,而在德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标志着一系列法庭程序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距今不远的过去。德国的公众确信,坐在审判席上的赫尔曼·戈林及其他被告确实负有责任,而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今天都相信,被推上东京法庭的人们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应当是1937年或1941年前的政治经济局势,或者是由军队和工业组成的利益联盟,总之不是单独的个人。1998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自尊》还把当时的政府首脑东条英机表现为盟军司法的牺牲品和殉难者。对于日本特殊的“不负责任系统”而言,这仅仅是其中一例。知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把这个系统视作1945年灾难的主要原因和特征。了解了上述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日本人对于被处决的甲级战犯的靈魂祭祀在靖国神社中的事实并不反感。

在社会领域,对待战争历史的不同方式还有另一个视角。在今天的德国存在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对战争和欧洲犹太人屠杀负有责任。而在日本,日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罪行的事实被日本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状况相对化了。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所导致的毁灭性破坏带来的体验,构成了指责战胜国(这里指美国)同样犯有战争罪的基础。简单说来,在德国,战争从1939年9月1日闪击波兰开始到斯大林格勒之战,然后直到所有德国大城市被摧毁都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在日本,人们评价战争通常从它的结束出发。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

记忆中的二律背反

感觉自己是专制与战争的牺牲品,在两国都不仅仅是由1943年起愈发占优势的战争对手造成的,也与德国和日本的内部局势有关。在战后最初的15年,德国人对1945年前的回忆有一种二律

背反的感觉,集中体现在“罪犯或受害者”的表述中。在被瓜分的德国,完全没有出现围绕专制、战争和灭绝犹太人的启蒙式公开讨论。那时的主题是把自己从“集体罪责”的谴责中解放出来。在多数德国人看来,应当对1933—1945年间的错误性历史发展承担责任的,是希特勒及其高层追随者所组成的犯罪政权,绝大部分民众因此迅速披上了受害者的外衣。德国军队在1942—1943年冬天蒙受了巨大损失,关在盟军战俘营中的德国俘虏数量巨大;在德国东部地区^①,德国人被驱赶出去;红军士兵在占领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犯下了强奸罪;城市被摧毁,战后的第一个冬天为饥饿所笼罩——这一切都使德国人产生了一种软弱无力、没有希望,甚至有时可以说是“自怜”的感觉。这种情感阻碍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客观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德国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主的出发点,旨在赋予西德的民主制度以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德国抵抗运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沦为纳粹政权的牺牲品)参加者的回忆显得十分重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人们追溯到了1933—1945年间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传统,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瑕疵的典范。

相对于纳粹集权和战争的记忆,东、西德内部针对大屠杀的批判性研究都退居其次了。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方式绝对算不上模范。恰恰相反,正如海德堡当代历史学家埃德加·沃尔夫鲁姆(Edgar Wolfrum)所说的那样,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的回忆,直到1960年左右都“被自身的受害记忆严重覆盖了”。^②1958年举行了乌尔姆行动队审判,1959年底发生了科隆犹太教堂亵渎事件,才引发了大屠杀问题上的态度转变。1961—1962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审判与1963—1964年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进一步扩大了相关灭绝犹太人记忆政策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这样认为,1965年第20个战争纪念日是有关灭绝犹太人的公共记忆的转折点。1965年5月在达豪集中营揭幕的纪念馆就是最好的例证,紧随其后的是众多其他纪念场馆在各地的建立。从此以后,针对1933—1945年历史的批判性态度逐渐增强,并涉及了那个时期的几乎所有问题。此后,德国对待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战争以及大屠杀的态度逐渐成为榜样,获得了赞赏。为此奠定基础的有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社会自由联盟、公开提及国防军在东欧犯下罪行的“新东方政策”,还有1968年前后大学生们针对他们的父辈提出的批判性问题,而且后者的作用尤其突出。这一点对于联邦德国在政治上融入西方联盟和欧洲共同体毫无疑问是减轻了负担。最后还必须提到美国电影《大屠杀》(Holocaust)在德国电视台的放映。该电影在1979年1月播放,分四个部分,以三个家庭为例,极其逼真地展示了犹太人的灭绝。超过14岁的人群中有大约30%—40%的人观看了该系列节目,它超越了世代,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德国人的认知当中,从而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一种记忆共识在日本就从来不曾存在过。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特别是对于20世纪30—40年代早期的这段历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因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经历造成的特殊认知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有关战争记忆的政策在几乎所有相关问题上都采取了与德国不同的标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朝鲜、韩国、苏联没有参加。日本政府在面对从前的战争对手时表现得相对克制。早在会议准备阶段,美国就放弃了所有赔偿要求,其他国家或地区也追随了这一政策,例如老

^① 德国人所说的“东部地区”是指在二战前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属于德国的领土,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划分给波兰。德国在二战爆发前夕吞并的捷克苏台德区不在“东部地区”所指的范围内。

^② Edgar Wolfrum, Die Suche nach dem Ende der Nachkriegszeit. Krieg und NS-Diktatur in Öffentlichen Geschichtsbildern der alten Bundesrepublik, in: Christoph Cornelißen, Lutz Klinkhammer, Wolfgang Schwentker (Hg.), *Erinnerungskulturen. Deutschland, Italien und Japan seit 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03, 193.

挝、柬埔寨以及台湾。和平协议没有规定日本需要赔偿的具体数额,该问题其实是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的。在1955—1976年间,日本的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主要是以经济援助的形式进行的,即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输出劳务。与此同时,日本内部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它相对比较容易满足这些国家的要求,并同时为自己的产品确保销售市场。日本与韩国通过多年谈判才在1965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对赔偿的要求也转为获取经济援助,日本对1910年后的殖民统治、强征劳动力、掠夺文化财富等负有责任,却被免除了作出明确忏悔的义务。在与中国1972年9月29日签订的协议中,日本采用的语言相比对韩国略微清晰了一点,表示在过去因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害,尽管如此却也获得了中国方面对赔款的放弃。为此日本在国际法上承认了中国,并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日本历史政策中的修正主义倾向

日本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得到迁就,在对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赔偿问题上取得了不寻常的有利条件,这种和解的局面可能会让人得出结论:日本政府和民众在结束占领和1952年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在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展现了理智的一面。这个印象是错的。日本在重新获得国家主权之后,保守势力把持政权长达数十年,其间自由民主党的政府与官僚阶层、经济精英结成同盟。在保守政权之下,许多在1945年前体制内职位显赫的前官员重返政坛。在这个方面日本并非特例。即使是在西德,也在若干领域(例如司法界)存在,其任职人员的延续性显而易见。在冷战爆发的政治对抗背景下,日本的清理措施和德国的去纳粹化基本遵循了一样的原则:一个纳粹分子或者极右军国主义分子经过清理程序就像是穿过一扇旋转门,再转出来时就已经变成了老练的反共人士。在日本的事态甚至发展到被拘禁了一段时期但没有被判定为战犯的政治家重新获得了最高职务,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许多在战争中位高权重的人得到了赦免。日本方面没有自己做出努力清理战争罪行。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可以观察到一种再民族主义化的倾向。日本中学教科书中有关1930—1945年间的描述被政治净化了。对国家教科书政策的个别批评者,例如历史学者家永三郎,长久以来在法庭上都没有成功的机会。相反,日本政府在1966年重新把“帝国建立日”定为国庆日,用以纪念神话般的神武天皇在2600多年前建立了日本。政府的此类修正主义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相对于围绕自身过去的批判研究,人们一般说来对经济增长和富裕繁荣更感兴趣。谁要纪念为战争献身的日本士兵,就去充满敬意地执行传统祖先崇拜意义上的仪式,为数众多的“战争记事”(戦記物)为此提供了素材,它们以特有的风格把普通士兵塑造为英雄。富有影响力的日本遗族会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并在自民党领导下成为保守政府的一个重要选举后援组织。

日本人直到今天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度一致化的族群。就政治观点而言,他们却不是这样。尽管多数民众对政府的修正主义立场在多数情况下都予以认可,但我们确实不应该忽略日本内部众多的批判声音。在对旧政权的批评者当中,主张战后立即给予亚洲邻国物质赔偿并全面承认罪责的那些人却一直是少数。人们不去寻找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而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寻找对战败负有责任的人。围绕1945年前的日本政治进行的批判研究在本质上是体制分析,政治家丸山真男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著作就是一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问题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在日本的历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天皇体制”也比对日本的殖民主义历史更感兴趣。左翼文学家针对支持旧政权的作家的清算,是以代际冲突的方式进行的。像汉学家竹内好这样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现代

化之路视为榜样,他们的观点被认为很有趣,但在比较文化批判的思想谱系中却停留在边缘。人们可以尖锐地指出,不论是政府一边还是民众一边,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针对日本与邻国关系的批判研究都为数甚少。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得以改变,这与联邦德国内部的发展有着显著区别。在德国,抗议的青年向他们的父辈提出尖锐的问题,而在日本的抗议主要集中在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上,批评首先是针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中国之旅引发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直到今天这一事件在日本仍被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对此日本当时完全没有准备。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领导下,日本外交发生转向,并开始寻求日中关系的新起点。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战争罪责问题又一次获得了重要地位和新的意义。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新回到公众的认知当中。这首先要感谢记者本多胜一,其著作《中国之旅》获得畅销,尽管他把日本军队的角色刻画为罪犯。^①虽然该书被右翼集团指责为“南京的谎言”,但这对该书的传播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教科书争端直到1982年才成为对待战争问题上的一个转折点。当年6月的日本报纸披露,文部省在审批几本历史书的过程中,强行要求修改有关1937年战争爆发的描述。具体说来,其中有个问题是要把“侵略”一词换成侵略性较弱的概念“进入”(进出)。该事态发展成一场外交危机(日本为一方,中国与韩国为另一方)。日本的官方教科书政策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它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的再民族主义化的一部分。日本的“泡沫经济”赋予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特征鲜明的新型民族自信,所谓的“日本人论”在文化理论界进入全盛时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以官方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人们应该看到,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绝不是仅仅针对亚洲邻国的,反美主义也达到了高潮,《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取得的成功就是标志,该书由右翼保守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的创立者盛田昭夫合作完成。^②

自20世纪80年代起,持批判立场的历史学家不顾这种民族主义倾向,致力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科学评价。知名历史学者藤原彰于1984年建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众多资料结集出版,科学地证明了日军于1937—1938年间在南京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该研究会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活跃,它激烈反对任何将“南京”从日本历史中抹去的企图。^③历史学者家永三郎的后续努力也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他在1984年继续通过法律手段与中学教科书审批程序奋力对抗。最后还必须要提到的一场辩论,是由1989年1月裕仁去世所引发,争论议题是“天皇对战争负有怎样的责任”,日本公众在这一问题上两极分化程度之严重,通过长崎市长本岛等的遇刺事件得到了体现。1990年初,一名右翼极端狂热分子因为市长对天皇的批评立场采取了报复行动,市长本人虽劫后余生,但也身受重伤。

对德日进行比较的开始

在充满政治冲突的20世纪80年代,把日本对待过去的方式和联邦德国取得的进展进行比较的科学家和媒体人士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公众面前。由于1982年的教科书丑闻,大家首先关注的是

① 本多勝一『中国の旅』、朝日新聞社、1972年。

② 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NOと言える日本』、光文社、1989年。

③ 参见 Yoshida Takashi, 'For the Nation or for the People? History and Memo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in: Sven Saaler, Wolfgang Schwentker (Hg.), *The Power of Memory in Japan*, Folkstone 2008, 23.

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以及面向以色列的和解政策。但日本保守势力一直坚决拒绝与联邦德国进行比较,他们的理由是,日本没有“奥斯维辛”需要负责。不过,在处理罪责问题上与德国的比较还是不断涌现。1985年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战争结束四十周年之际发表的演讲与同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85年夏天起,日本内部围绕魏茨泽克的演讲展开了密集讨论,对于持批判立场的左翼而言,德国总统毫不含糊地公开承认了德国罪责,并分别举出了受害群体的名字,这不啻为正确面对战争责任的宣言。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日本公众而言,承认战争罪行仍然是困难的。尽管在自民党政权结束后,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和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都明确承认了日本对殖民统治和战争负有责任,日本国会却没能借战争结束50周年之机达成一份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罪责忏悔声明,1995年夏天通过的决议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期望。

魏茨泽克在1985年发表的演讲获得了积极共鸣,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与保守的日本相比,在联邦德国已经形成了有关专制和战争责任的政治共识。这种印象是错的。即便是在德国,对1945年前的记忆仍然充满争论。这一点在1986—1987年间的所谓“历史学家之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场争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的圈子。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名为《不肯消失的过去》的文章,从而引发争端。^①他在文章中用一条因果链把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的罪行同布尔什维克与斯大林式的古拉格的罪恶连在一起,从而把大屠杀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相对化了。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周报》上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的保守历史学家,并指责这些人是想通过他们对德国1945年前历史的描述达到某种“止损”的目的。这两篇文章在德国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主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德国对战争和大屠杀负有的责任。

德国的“历史学家之争”就像日本围绕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产生的争论一样,都有政治的背景。赫尔穆特·科尔在1982年掌权之后宣布了“精神道德转向”,之后不久他就创造了“宽恕新生代”这一新表达方式,并被某些修正主义的日本政治家拿来使用。他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5年共同到访了比特堡(Bittburg)士兵公墓,那里还埋葬有几名党卫军成员。因此,该事件激起了德国公众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也感觉受到愚弄,认为科尔卑鄙地利用了美国。这一事件显示,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的保守力量与日本相似,都企图掀过自身历史的黑暗一页并与之划清界限。他们在日本比在联邦德国更成功,因为事实证明,日本国会和公共舆论中的政治反对派过于虚弱,不能成功地与修正主义进行持久对抗。

记忆政策的不和谐音符

自1990年起,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在一段时间内把有关1945年前历史的全部议题都推到了幕后。德国的重新统一把政界、学术界和公众的目光都聚焦在“另一个德国专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之上。在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在数年间动摇了被经济成就过分抬高的民族自信,但即使是在这些年中,那些依照德日保守势力的愿望应该消失的过去仍然没有逝去。正相反,针对两国在战争中角色的研究仍在继续,我们可以从中明显看到,越是把日本和德国

^① 参与辩论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收录在: N. N. ,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2. Aufl. , München 1987.

放在一起比较,越能发现两国最新讨论的发展路线愈发相形渐远。这主要是针对日本来说的,日本人听不进去道德劝告,而德国对待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的反省,就是不同日本比较也能说得过去。

表面上看,在德国公众中已经确立了有关战争和大屠杀罪责的广泛共识。这样的论点在现实中有令人信服且显而易见的证据。2005年5月德国在柏林市中心为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举行了落成典礼,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地象征德国人对待历史上最黑暗篇章的公开坦诚态度了。围绕这样一个纪念场所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产生的尖锐政治分歧,被纪念地毕竟得到设立的事实遮蔽了。此外,2002年启动的德国迄今最昂贵的人文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社会主义德国1933—1945年间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与谋杀”系统记录了相关史实,并在2008年出版了由16卷组成的全部著作。

同一时期,围绕正确对待德国在1933—1945年间历史的冲突和争论总是不断涌现。这似乎表明,最好不要下结论说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共识。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彻底摆脱了旧式的“希特勒主义”,并指出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对大屠杀负有责任。^①格茨·阿利(Götz Aly)在2005年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描述为“给人好处的专制”,从中很多德国人可以获取利益。^②两本书在传媒界都招来了批评者,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罪责议题。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伊格纳兹·布比斯(Ignaz Bubis)在多种场合指出,不管我们是否希望如此,“历史”都不可能得到“反思”,而是始终在现实中陪伴着我们。因此,他在1998年用激烈的方式反对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诋毁大屠杀记忆的尝试,这位德国著名作家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接受了“德国图书交易和平奖”,他在致谢中警告说,不能把奥斯维辛作为政治工具加以利用。在1995—1999年间以及2001—2004年间,国防军展览也引发了类似的激烈争论。这些展览揭穿了围绕国防军的“经典叙述”在战后塑造的神话,根据这一叙述,德国国防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总是行为正当,并没有参与对东欧犹太人的谋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外交部身上,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委员会在2010年证据确凿地指出,德国外交官并没有为针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提供庇护,反而参与了谋杀犹太人的准备工作。^③就是一些德国中学教科书对于1945年前德国历史的描述,在看待德国处理战争历史的理想化目光下也是站不住脚的。大屠杀研究者托马斯·桑德库勒(Thomas Sandkühler)在首都柏林的中学课本中发现了许多“专业错误、荒唐说法与不准确的描述”。^④虽然如此,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通常情况下,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灭绝犹太人的话题在中学教材与课堂上都得到了广泛讨论。

相比较而言,日本最近几年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愈发成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操纵的议题。这一点比德国明显得多,并导致了历史议题上的尖锐两极化。以教育学者藤冈信胜和日耳曼学者西尾干二为中心的右翼学者于1996年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他们的目标是帮助日本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为此他们鼓吹这样的教科书政策,旨在为日本的青少年儿童重新描绘一幅值得骄傲的历史图像,历史罪行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下是没有位置的。科学证实的史实被他们的“真相”描述歪曲了,有损日本形象的事件被美化了。该团体的努力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保守主义阵线发起的一场全面战役的组成部分,这一阵线由后援社团、像《产经新闻》及其背后的出版社这样

① 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New York 1995.

② Götz Aly *Hitlers Volksstaat. Raub, 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5.

③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④ *Der Spiegel* 27. Januar 2014.

的传媒机构以及“日本会议”组成。他们鼓吹历史修正主义,并通过有技巧的媒体政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例如西尾干二出版于1999年的《国民的历史》就十分畅销,它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日本刻画为一个“独立的文明”(独自の文明)^①,这背后不仅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坚决拒绝所有战争罪责指控),还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按照保守主义者的信条,日本既不是中国的派生文明,也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嫁接。

新保守势力在过去这些年通过新旧媒体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但如果就此认为他们是多数人意见的代表那就错了。保守势力推出的两本历史教科书虽然在2001年获得通过,但不能在图书市场上有所斩获,采用《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的学校还占不到全体中学的1%。对此发挥作用的是持批判反对立场的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与广播电视记者构成的公众力量,由于他们的努力,修正主义分子重新解释1945年前日本在亚洲的历史的所有企图,总是不断受到尖锐批评。另外,日本的女权主义者现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要感谢上野千鹤子以及其他人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断提出有关“慰安妇”(强迫卖淫的日式委婉表达)的话题。^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NHK(日本放送协会)的新会长舛井胜人因为自身言论接受国会质询的事件,他声称这类妓院在战争时期从来都是到处都有,从而在2014年1月引发一轮抗议浪潮,但他深得首相信任,既没有辞职,也没有被解雇。故意否认或美化历史真相的人得到如此宽大的处理,这应当归咎于日本眼下并没有真正具备决定性力量的反对派。类似的事件如果放在德国肯定不会无果而终。

但是,安倍首相能够“统治下去”,而且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几天后抽出时间,邀请自己的夫人(她在福岛原子能问题上是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去看电影。安倍夫妇观看的电影名为《永远的零》,在年终年始的日本十分卖座,它讲述了一个神风飞行员为国效力的故事,改编自作家百田尚树的作品,他如今是NHK董事会的成员。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安倍在文章开头引用的《法兰克福汇报》访谈中提到了针对历史的“谦逊态度”,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作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日本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西尾干二『国民の歴史』、産経新聞社、1999年。

② 参见 Chizuko Ueno, *Nationalism and Gender*, Melbourne 2004.